

低生育率危机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变迁研究

李璇

韩国庆南大学 韩国昌源市 51767

摘要: 过去20年韩国生育率呈现出显著的逐年下降趋势,晚婚晚育现象凸显,生育年龄也不断拉高,新生人口率也逐步减少。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国家消费水平和国家生产力水平,为了应对低生育率危机,韩国政府颁布并实施了若干生育奖励和家庭福利政策。然而生育奖励和家庭福利政策并没能很好地提高生育率,也无法缓解生育率逐年下降的趋势。本文探究了韩国低生育率的背景,并研究了基于当前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的变迁,以期提供借鉴。

关键词: 低生育率;韩国家庭;福利政策;政策变迁

引言:

一个国家的生育率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经济、国民消费以及国民生产力的水平趋势,国民人口作为国家发展的内驱动力是重要的竞争资源。过去20年间,韩国的生育率呈现出逐年快速降低的趋势,同时晚婚晚育现象凸显,生育年龄不断拉高,韩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的状况,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了韩国国民度高且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自韩国政府开始着手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以来,先后不断出台相应的生育鼓励政策和家庭福利政策,持续加大对解决生育问题的支出。从2006年开始,到2020年,韩国政府为了应对低生育社会问题投入了152兆韩元的财政支出^[1],但依旧无法缓解当前国家低生育率迅速降低的状况。因此,探究低生育率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的变迁尤其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韩国低生育率背景

人口增长率是衡量人口变动的标志性指标,包括阶段内自然增长率和社会增长率,是国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的基本依据。自1996开始,韩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保持在1%以下的水平,在2000年左右持续快速下降,到2017年,韩国人口增长率仅为0.28%。

韩国人口增长长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影响因素是韩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自2000年以来,韩国总和生育率逐年快速降低,只有在2007年和2012年迎来短暂的回暖,但是总和生育率依旧不断降低,低生育率问题十分突出。

截至2021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创造了历史最低的0.81的记录,排名全球垫底。良性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

2.1左右,1.5的生育率已经是很低的总和生育率,即使是回暖的2007年和2012年,总和生育率也仅为1.25和1.3,总体而言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常年处于1以下。从韩国的育龄女性生育数来看,韩国产妇育龄年龄从2000年左右的25-29岁逐渐迁移上升至30-34岁。总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韩国低生育率背景形成原因

(一) 早期韩国实行生育控制政策

韩国历史上也出现了实行生育控制的时期,并且依然对今天韩国低生育情况产生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每年的新生儿数量有七八十万人,随着生育控制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十年间新生儿人数不断减少,迎来了断崖式下降,在这之后持续影响韩国的生育率走低。在这一政策影响下诞生的婴儿现如今正进入婚育年龄,但受到生育控制的影响,婚育年龄中的年轻人既要承担照顾父母的责任,还要面临职场事业挑战,生育的负担增加,同时结婚登记总量不断减少,未婚同居化、少子化的现象不断增加,导致新生儿数均持续下降。

(二) 文化价值和生育理念改变

随着韩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多样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不断碰撞,对国内适龄婚育男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韩国,女性婚育是一个涉及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的重要事件,女性的家庭角色价值观也迎来的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生育控制政策下诞生的一代人,兄弟姐妹较少,大家庭变成了核心家庭,父母相对会关照得更多,新成长背景下的女性更不愿意进入照顾家庭、照顾小孩的角色中,而很多男性在家庭育儿之中长期处于缺位状态,韩国的男本位思想还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次,女性

作者简介: 李璇(1987—),性别:女,民族:汉族,籍贯:山东临沂,学历:博士在读,研究方向:东北亚。

经济活动不断增长,女性在社会活动和职场中逐渐成为重要力量,女性的价值体现已经不只限于在家庭之中,而是在多个领域中,这也导致了女性将自身投入到了她们认为的更重要的环境之中。再者,即使适龄男性、女性进入婚姻,也需要面临来自社会规范、家庭环境、两性关系、生活压力等多样化的压力之中,在生育会带来困扰的情况下,婚姻中的男女也更不愿意生育。最后,韩国男女要承担同等家庭责任的基础上,男女的理想子女个数在不断减少。

(三) 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影响

韩国社会经济在持续发展,但是国民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增长,经济发展因素成为制约生育的重要因素。首先,随着韩国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国民希望收入增长能够更好地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生育要舍弃或者降低自身期望的生活质感,那么适龄人口会选择晚婚晚育或者不婚不育。其次,生育成本成为适龄人口的负担,结婚和生育所具备的生活开支是一项长期的投入,和过去相比,生育成本大幅提高,养育子女的难度不断上升。再者,孩子出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家长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而这样的强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子女更好的生长条件,部分已婚人士也会选择晚育优生。

三、韩国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福利政策变迁

为了应对低生育率问题,韩国政府不断通过阶段性规划出台相应的家庭福利政策,以阶段性生育政策为基础计划,制定了家庭、生育、老龄化等方面的相关计划(见表2)^[2]。本文将针对《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和《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开展讨论。

3.1 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社会基本计划

3.1.1 第一次《基本计划》(2005)

随着韩国生育率不断下降,总和生育率常年低下,同时多元的社会环境、变化的家庭形态、改变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更削弱了韩国传统家庭功能。在这个时期的韩国社会发生了以下变化:首先,韩国的社会家庭结构产生了变化,一人家庭以及双职工家庭的家庭结构不断增加。其次,韩国的婚姻观也产生变化,传统稳固的、整体的大家庭观被核心家庭观所取代。再者,韩国的离婚家庭和再婚家庭比例也不断增加。还有,韩国的社会开始流行以个人为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婚姻也成为了一种年轻人的选择,而不是

必须完成的人生命题。

因此面对亟待解决的养育成本、婚龄变化、婚育难题、价值观变化等多种问题,2005年,韩国制定了第一次《基本计划》,针对健康家庭、低生育率以及高龄社会问题展开政策支持。第一次《基本计划》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回复良好的家庭氛围和家庭环境,从社会整体上建立家庭价值观并鼓励生育,因此该次《基本计划》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重点是构建家庭支持体系和养育社会体系。第一次《基本计划》为父母提供个性化支持,加强对工作女性的支持,为育儿公共性提供了经济支持。

3.1.2 第二次《基本计划》(2012)

第一次《基本计划》之后,韩国的生育呈现缓慢上升,但是整体生育率还是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问题依旧严峻,同时计划中构建的家庭支持体系依旧没能改变家庭功能弱化的现实,同时男性大男子主义的社会价值观亟待改善,男性在家庭中的育儿参与率严重不足。

因此韩国政府扩大了《基本计划》的实施范围,并根据第一次《基本计划》实施的效果,在2012年制定了第二次《基本计划》。第二次《基本计划》为构建家庭支持体系、生育友好型社会、两性平等文化做了更大范围的计划。首先,第二次《基本计划》将家庭支持体系的中心扩大到所有家庭的特点,并支持定制差异化养育支持方案。其次,通过促进两性平等和工作家庭平衡来为父母赋能。再者,通过孕妇关怀、育儿保障来加强人文关怀和创建友好的社会和环境。

3.1.3 第三次《基本计划》(2016)

然而前两次《基本计划》的实施并没能改善韩国低生育率危机,韩国的社会生产力人口减少,同时韩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面临着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整体趋势,韩国政府决定从更广泛的范围以及更长远建设上寻求解决低生育问题的路径。2016年,韩国政府制定了第三次《基本计划》,集中举国上下的力量,在原有的政策覆盖面基础上,将就业、教育、居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囊括进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在家庭支持体系上,进一步考虑到不同家庭形态和需求周期,将家庭、单位、社区组合成一个社会支持体系的整体系统之中,并提供更广泛的服务支持和生育关怀。第三次《低生育率基本计划》已开始从个人责任角度制定相关政策,加强了晚婚和非婚人口的社会责任,从实际压力上刺激适龄人口结婚生育。

3.2 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

3.2.1 第一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06-2010)

2006年,韩国政府根据《婴幼儿保育法》的相关内容,立足于双职工家庭的现实和婴儿保育的需求,着手制定了第一次的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确立了本次五年计划的基本目标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保育的公共性和整体的服务质量。

2008年,韩国政府针对韩国国内家庭组织结构越发多元的情况,还有实际韩国家庭的保育情况,进一步制定了《关爱儿童计划》,并且和第一次的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中的保育公共化相适配,针对不同类型的保育服务需求家庭提供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3.2.2 第二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13-2017)

在2012年,韩国政府开展了第二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的制定工作,并针对一下方面开展实施工作:首先,第二次《长期保育基本计划》扩大了保育费用和养育津贴的适用范围,加大了对保育的经济支持,并且强调保育的公共责任。其次,建立在第一次计划对保育服务的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保育服务质量和个性化方案定制,并且积极开阔渠道促进养育家庭参与到保育服务中来。

3.2.3 第三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2018-2022)

然而,两次《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并没能挽救当前韩国持续加深的低生育率危机,同时

政府大力推行的保育服务质量并没有获得公众的认可。因此韩国制定了第三次的计划,本次计划的主要目标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优质保育服务,幼儿园公共性建设,养育能力,保育和养育的社会责任,构建幸福社会。

四、结束语

截至2021年,从多项公开数据可以看出,韩国总和生育率连续两年全球垫底,韩国当前的低生育率问题形势严重,而且呈现出显著的越来越低的趋势。综上所述,韩国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主要受到早期限制生育政策、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社会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对《健康家庭基本计划与低生育率和高龄社会基本计划》和《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的变迁探究,可以明显看出当前韩国政策的工作重点放在了生育率上,同时生育问题和家庭问题、社会文化、雇佣关系、两性关系等多个方面息息相关,需要更长期、综合、全面的规划。比如进一步为生育期女性提供稳定的工作保障,增强男性角色在保育中的作用等等。

参考文献:

[1]金炳彻,都南希.低生育率危机背景下韩国家庭福利政策变迁研究[J].社会保障评论,2020(02).

[2]刘玉.发达国家应对低生育困境的政策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延安大学,2021.